

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六四之后，高层发生巨大分歧，老左派趁机发难，清除了同情自由派的改革派，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2) 90年代融入体制内

90年代是自由主义融入政权体系的蓬勃发展时期，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了媒体的重要岗位和大学讲堂。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力，影响力超过了80年代，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却并不完善¹。自由派知识分子凭借其对西方市场经济下法治、体制、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经济运行规律等诸多理论的熟悉，通过其占领的媒体和大学讲坛全面而系统的宣言上述理论，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思想派别。

主要领军人物有李慎之²、朱学勤³、徐友渔⁴、刘军宁¹、

1 当时甚至连《公司法》都未出台。

2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2003年4月22日），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198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后辞职。李慎之晚期研究自由主义，著有《风雨苍黄五十年》。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

3 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

4 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秦晖²等人。他们互相应和，梳理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学理，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1998年5月，李慎之在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刘军宁论述了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

秦晖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秦晖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90年代，新左派思想兴起。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进行了多次争论。争论内容将在后面“新左派思潮”一节中论述。

¹ 刘军宁，男，1961年生于安徽，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是当代中国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2002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该所开除。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² 秦晖（1953年12月—），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作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等。

3) 新世纪以来受到一定限制

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个阶层都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国有企业，阶级构成是党政军企高级干部，政权体系采取党国专制的政治吸纳方式。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却试图将所有国企私有化，试图将让所有资产阶级不分出身按资本体量分享政权，建立宪政民主和代议制政府，这些主张与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相容的。进入新世纪，大型国企成为巨型垄断寡头。在这个形势下，新自由主义的黄金发展期结束，当局对仍坚持宪政民主的自由派进行了多次打击：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清除出大学讲堂，自由派的重要阵地被整肃，部分维权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关押。

2008年，303位自由派¹签署发布《零八宪章》，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零八宪章》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绝大多数宪章签署者都受到了官方的打击。国内媒体没有任何关于《零八宪章》的报道。2009年12月25日，北京一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10年后，金融危机下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农民征迁上访和工人罢工维权频发，这些事件背后常见自由派活动家的身影。2013年开始，当局重点打压自由派活动家。2014年6月13日，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维权律师浦志强²逮捕，随后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一些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包括鲍彤、丁子霖、刘军宁、戴晴、于浩成等。

2 维权律师浦志强，积极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妥善解决六四事件，常代理维权辩护案件。

2017年12月26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判处吴淦¹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3年4月，北京公盟创始人许志永²遭到软禁，此后被逮捕、审判，2014年1月26日被宣布判刑4年。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2016年7月1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炎黄春秋》³，宣布原社长、总编辑等悉数被撤换，并任命了新的管理层。2017年1月2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闭天则所⁴网站，主要人员的微信和微博也无法使用。2018年11月，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其营业执照。2019年8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指控天则经济研究所违反监管规定，并下令强制关闭该研究所。

但总体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是非常成功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内心，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工人思想。城市中产群体在整个党国体制下受到的压迫和感受到的不公平比资产阶级更强，很多人对西方关于文艺、法律、经济、政治、国家的理论津津乐道。

这些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执政者并无区别。未来一旦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无法像往常一样延续统治，这时新自由

1 吴淦在2009年邓玉娇案中，曾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娇并积极推动了该案的迅速传播，并参与过多起维权事件。

2 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许志永等人创立的机构，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以期能够理性、建设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2003年，许志永、滕彪、俞江三人曾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开始；他们还参与代理了不少维权官司，撰写了若干有关中国当时热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并开展了几个促进社会公正透明的公民参与项目活动。

3 《炎黄春秋》从2002年之后，成为自由派的阵地。《炎黄春秋》发表了大量解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4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軾、张曙光、盛洪等人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这是一个自由派智库组织，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

主义仍有可能登台入室，再次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二节 其他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

除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外，还有一些形形色色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中形成体系的有两种，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新儒家。这两种意识形态，阶级基础薄弱，社会影响不大。

(一)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批判了多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曾经被批倒的社会主义思潮又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以学术词汇包装，复活了。所有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潮，其主张都是在不动摇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正。既然不动摇私有制，也就不会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并且这些人也无意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正因为如此，这些主张的提出者，以及一些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者们，完全没有门户之见，互相唱和，也算是特色社会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所有这些思潮中，影响相对较大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曾撰写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

煌。谢韬在文章中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意识形态。它也号称社会主义，但是却坚持唯心史观，漠视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它也渴望民主、批评当局专制，但却主张超阶级的民主；它也承认贫富分化以及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但却不承认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它要求在分配领域二次调整财富，但却不愿触动私有制分毫；它渴望限制官僚的特权，但却不相信群众，反对群众运动；它有时也会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但是却不敢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解决贫富分化等各种问题，但却不愿意消灭必然产生这些问题的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面临的最大矛盾，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矛盾在理论上的体现。

除了民主社会主义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如吴敬琏曾提出“市场社会主义”，高尚全曾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这些主张，如果将他们文章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全文替换为“资本主义”，丝毫不会影响文章原意，由此可见这些“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

上面所列出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其提出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还是政府高级官员。与特色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的是，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不再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除了名字中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以外，其内涵完全看不出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些“社会主义”都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范畴。

(二) 新儒家的主要思想

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意

识形态，因之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强调顺从、等级制，是能够为资产阶级所用的。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新儒家思想顺势而起。

新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最落后而反动的；新儒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几乎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因此影响也是不大的。

新儒家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新儒家大师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主张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比如，蒋庆赞成儒家学说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蒋庆提出了“儒教宪政”的理念。儒教宪政的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虚君共和制、议会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关于虚君共和制，蒋庆主张抬举孔子后裔为虚君。议会三院制就是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通儒院不由选举产生，是从儒家饱学之士中选拔组成。通儒院可以最终否决其他两院的议案。另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不过他也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康晓光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主张由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掌权。

新儒家在经济上是反动的。新儒家张祥龙建议，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新儒家在教育上是荒谬的。王财贵提出“老实大量读经”理论，它定了一批经典书目，包括大学、论语等，约 30 万

字，要求学生“只管读，不要管懂不懂”。所谓“大量”，是平均一天要读经 6 到 8 小时，到最后达到进入最高学府文礼书院的标准“包本背诵 30 万字”。所谓包本，就是能无错漏、不间断地背诵整部经典。王财贵在全国建立了至少 50 家学生在 50 人以上的读经学堂。学堂严禁老师解释经典的含义，他们只需要知道六个字：小朋友，跟我念。除了圈定的经典之外，学生不能阅读任何课外书，手机也由老师保管，学生也极少接触外界信息。进入文礼书院的孩子将至少在这里学习十年。年龄处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进入读经学堂，本身就是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制止，学堂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受到惩处，这是很意味深长的。

大部分新儒家主张等级制，反对民主，主张精英政治。这与当今世界的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他们的政治主张，如关于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儒家特区等，完全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成立儒教、儒化中国更是痴人说梦。

第三节 老左派思潮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最核心的两个领导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二人曾联手清算文革派，扳倒华国锋。在是否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主张是一致的，在怎么推进改革开放上，二者出现较大分歧。邓小平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陈云身边聚拢了一批相同主张的老干部，包括李先念¹（1909-1992）、王震²（1908-1993）

1 李先念（1909 年 6 月 23 日～1992 年 6 月 21 日），文革中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1982 年 9 月～1987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 年 6 月～1988 年 4 月任国家主席；1988 年 4 月～1992 年 6 月任政协主席。

2 王震（1908 年 4 月 11 日～1993 年 3 月 12 日），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 年 5 月担任农垦部部长；1975 年 1 月～1983 年 6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打倒“四人帮”，王震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 年 4 月～1993 年 3 月任国家副主

和邓力群¹（1915 年-2015 年）等。他们的主张比邓小平派稍左，被称为老左派。

老左派是在与邓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老左派与邓派的斗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1 年-1991 年，是两派的拉锯时期；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到 2001 年建党 80 周年，老左派失去体制内的地位，转而以杂志为阵地，继续开展斗争；2001 年之后，杂志被停刊，老左派以网络为阵地，开展新的斗争。

（一）基本发展过程

1) 1981-1991 年间的老左派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过程呈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状况。一放就乱：改革派的改革政策造成诸侯经济，各地胡乱投资，乱上项目，很快导致经济过热；一管就死：老左派发动反击，进行治理整顿，导致经济紧缩。

这个期间，老左派抓住改革派的一些政策失误，发起了多次斗争。

老左派的第一次斗争，是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打击改革派。1983 年 3 月 14 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周扬²在中央党校的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称社会主义可能异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随后

席。

¹ 邓力群（1915 年 11 月—2015 年 2 月 10 日），1981 年 1 月至 1987 年 9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1982 年 4 月至 1985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从 1980 年代初开始，邓力群紧跟陈云，坚持老左派立场。1990 年代，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年老或故去之后，邓力群被改革派称为“左王”。

² 周扬（1908~1989），1930 年在上海开始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文革”中受批判并被监禁。文革结束后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在得到邓小平支持后，清污运动正式开始。然而，老左派却力图将清污运动推向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领域，当时一个说法是，“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超过了邓小平许可的范围。清污运动开始不久，即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改革派的抵制。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一个说法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搞了28天就偃旗息鼓。

随后，老左派借助1986年的学潮将胡耀邦拉下马。整个80年代，大学校园的政治氛围很浓厚，很多知识分子宣扬自由主义，很多学生成立思想类社团，各种学者办讲座、开论坛，讨论政治问题。而当局中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对此比较宽容。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学潮从合肥发端，在上海、武汉和北京等地扩展开来。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总书记胡耀邦主张宽容、冷处理，受到老左派激烈攻击。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当时媒体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1987年1月10-15日，中央召开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胡耀

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借助 89 学潮发起反攻。到 8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问题越发明显。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高官子弟通过双轨制搞官倒大肆敛财，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增加。在这个背景下，1989 年 4 月-6 月，从北京发端，爆发了 1980 年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学潮，最后以学潮被镇压、赵紫阳下台告终。1989 年 6 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导致了 89 事件，老左派趁这个机会发动了又一波反击，这个阶段老左派的领军人物是邓力群。这段时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媒体及各种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市场经济的文章。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将损害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罚的倾家荡产。这段时间是老左派力量的一次短暂回潮。

2) 1992-2001 年间的老左派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政治形势急剧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老左派很快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随着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等人的年老及故去，老左派从外部影响党和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基本消失。但老左派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利用《真理的追求》、《中流》、《当代思潮》等杂志开展理论斗争。

这个时期老左派利用三个杂志长期坚持反对私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在 1995-1997 年发布四封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万言书；同时，还在 1997 年发起反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所有制观点文章的斗争。

杂志方面。邓小平在不同时期说过一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三个杂志的主要斗争方法是，用邓小平的一部分话反对他的另一部分话。主要斗争方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失去了体制内的力量，这几个杂志一开始办的格外艰

难，缺少资金，发行渠道也不畅。杂志主办人想了非常多的办法，征集网友捐款，在全国自办发行站。各地的杂志发行站团结了一大批前文革造反派和国企老工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各地的左翼积极分子，在杂志被停刊之后仍然坚持活动。

1995年-1997年，老左派出四封万言书，反对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万言书在各级干部和社会上广泛传阅。1995年，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在全国流传，作者未知。万言书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已经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同党内的走资派沆瀣一气，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95年秋季，第二份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在社会上传开，仍然匿名。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我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形势。文章认为我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1997年1月，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问世。这份万言书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份万言书的补充，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者、作家和媒体的名单。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步占据了一大批重要媒体。万言书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作家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老左派失去了体制内的阵地，又不能发动群众，并且不能将阶级立场贯彻到底，这几封万言书未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自然归于失败。

批评厉有为。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认为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公

有制是拔苗助长；主张我国的所有制应以私有制为基础；认为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1997年2月10日，《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28期发表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文章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厉有为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要求：“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受到老左派的批判，厉有为仍然在十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4月，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厉有为。

这一波斗争到2001年建党80周年后当局将《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为止告一段落。

3) 2001年建党80周年之后的老左派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发表吸收资本家入党的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就是指资本家。老左派提前知道江泽民将要在党建方面有所突破的风声，先发制人发表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等文。7月20日，邓力群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上网流传。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散发。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这标志着老左派与当政者的公开决裂。2001年8月，《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停刊，《当代思潮》转向支持改革开放。老左派失去了最后的体制内阵地。失去杂志阵地后，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老左派开辟新的阵地，创办毛泽东旗帜网，支持创办乌有之乡网，展开新的斗争。

网站方面。经过短暂的蛰伏，老左派转战“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老左派为这两个网站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帮助，并为其协调各种关系。两个网站发表了大量的澄清前三十年史实、为文革正名，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导向改革的文章，每年举办各种纪念会和网友线下活动。很多青年受这两个网站文章的启蒙，开始接触左翼思想，还有一些人成为左翼行动派。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二者相继创立其他网站。随着网络生态的变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兴起，独立网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些网站平台也转战自媒体，力图在新的时期跟上社会的脚步，继续传播左翼思想。

除了网络论战外，老左派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热点事件掀起舆论旋风，最出名的就是三大旋风：郎咸平旋风、刘国光旋风和巩献田旋风。

郎咸平旋风。本世纪初，MBO（管理层收购）甚嚣尘上，国有资产被大量侵蚀。2004年8月起，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文章，认为国内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国有企业以产权改革为名，变相侵吞国有资产。当时的背景是，国内经济学家鼓吹MBO，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郎咸平还分析总结了格林柯尔集团实际控制人顾维军收购公司的各种手法，揭露其用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这个期间，老左派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郎咸平的观点，掀起了一波郎咸平旋风，最终导致顾维军被捕判刑。

刘国光¹旋风。2005年7月，一篇访谈文章《刘国光谈

1 刘国光，经济理论家，曾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改革开放初期，刘国光是市场经济的吹鼓手。1997年经济学界发动“思想解放”，为产权改革制造理论根据，刘国光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网上流传。刘国光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加强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老左派就此发动一波攻势，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刘国光旋风”。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主流经济学界难以回避该问题，也组织人回击老左派的批判，高尚全、吴敬琏、晏智杰和何祚庥等人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

巩献田¹旋风。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献田旋风”。巩献田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并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老左派借物权法问题，发起了多次签名上书活动，最多一次签名者达3000人。然而《物权法》最终还是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老左派的主张

老左派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并不完全一致。

陈云时期的老左派，反对文革，反对群众运动；在农村

1 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支持分田到户；在城市反对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主张建立鸟笼经济；不承认 76 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希望最高领导拨转航向，或者开一次新的遵义会议，重新回到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的路线实际上类似于苏联在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时期的路线。

陈云之后的老左派，一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总结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他们愿意承认文革的进步意义，甚至完全赞同文革，但是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

老左派在与改革派的斗争过程中且战且退，最终归于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老左派思想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老左派的一部分人，以魏巍¹和李成瑞²等人为代表，在与改革派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思考，思想发生了转变。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和平扭转局势的可能，认为中国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工人阶级。这些人已经转变为马列毛主义革命派，而不再是老左派。

随着老左派的主要群体逐渐老去、故去，老左派思想在老工人群体中仍然有一定影响，但对新一代工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

老左派群体不是以年龄划线的思想派别，有一些年轻人也持老左派思想。

1 魏巍(1920年3月6日-2008年8月24日)，著名作家，军队高级干部。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该文曾经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现在不少版本的语文书已将此篇课文删除）。1978年，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2 李成瑞(1922年1月——2017年2月11日)，曾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1981年10月-1984年5月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第四节 新时代泛左翼思潮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一方面是 90 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和国企工人大下岗，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破产，农村土地撂荒严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基层矛盾非常严重，每年群体上访事件数万起，三农危机全面爆发。

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两种站在人民群众立场的思潮：新左派思潮和乡建派思潮。

（一）新左派思潮

90 年代中后期，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左翼研究成果、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关于政治、经济、历史、现实的系统看法，这就是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大量吸收了詹姆逊¹及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批判，主要思想家有汪晖、崔之元、杨斌、陈学明、王绍光等。

90 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以几个杂志和新闻媒体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他们争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致理清新左派的主要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

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杜克大学教授，他在《60 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 60 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

关于怎样看待全球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化，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边缘”理论¹，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汪晖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汪晖反对中国加入 WTO，他发出质问：“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 WTO 和如何加入 WTO 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杨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杨斌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杨斌反对中国加入 WTO：“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关于如何看待腐败和社会不公。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认为，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结果。汪晖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

2 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其理论源泉是萨米尔·阿明等人的依附论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论。

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陈学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级分化：“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他的理由是：（1）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2）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3）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4）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关于怎样看待1956年至1976年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毛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并未失败，中国还是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汪晖赞同文革，并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王绍光写过一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书《超凡领袖的挫败》，研究视角虽然是社会学的，但是对文革的评价远高于官方。崔之元支持文革，认为文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有力手段。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尝试‘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有正面因素和积极

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关于怎样看待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从语境上看，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王绍光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王绍光认为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

新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对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锐利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必然要发生的社会危机，基本上都被新左派言中。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加入 WTO 以来，经过将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未如新左派所预料，出现产业被跨国资本控制、失业潮和政府垮台等现象，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失误，要从新左派的思想源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中寻找根源。

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新左派也发生了转向，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成为国家主义者，如甘阳、王绍光、韩毓海等人¹。

新左派的活跃分子多数是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局限于学术领域，与工农群体和工农运动是疏离的。新左派思潮是知识分子的左翼思潮，是一种脱离了阶级

1 例如，韩毓海在著作中重新审视 500 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得出结论说，500 年来历史消长，核心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

和阶级运动的思潮。

(二) 乡村建设派思潮

9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出现严重的困境，从2000年开始，一些青年学生自发下乡调研，主要成员是来自全国不到10所大学的学生，主要目的—是访贫问苦，深入了解农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二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杂志社创办了农村版，温铁军任主编。《中国改革—农村版》花了大量的精力帮农民反映问题，帮助农民维权，还评选农民维权先进分子。借助这个平台，民间自发的学生下乡运动规模越做越大。到2003、2004年的时候，全国推广到上百所学校。这时候下乡不再是纯粹的凭兴趣爱好，2004年之前的时候很多学校已经有自发成立的支农社团，学生专门下乡去做一些教员。2004年底，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相波¹和数位下乡支农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一道，注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称“梁中心”或“乡建”），其宗旨是：通过激励和帮助，使农民自强自立，团结协作，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最终实现经济、文化、环境的和谐发展。梁中心很快聚集了一批理想主义分子。有不少在校大学生休学一年，专门参加到梁中心的支农活动中来。

梁中心以“生态农业、农业互助合作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主要主张，实际上是代表资本主义体制下受压迫的小农的意识形态，希望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把小农组织起来，对抗不断侵蚀农村的大资本。

梁中心以志愿者为主，其志愿者大多来自高校，学生们

1 刘相波是梁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刘相波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原为天津科技大学讲师，授课之余，从事学生社团辅导工作。2010年辞去教职，专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执行总干事工作。刘相波长期跟农民打交道，为农民服务，农民们称呼他为“刘老师”，但他认为自己懂的不比农民多，干脆改名叫做“刘老石”。不幸的是，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因车祸在天津去世。

报名后经过筛选与培训，然后被派到全国各地的点，进行调研、支教或指导农民建立合作组织。

梁中心最初在服务农民、培训学生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乡建思潮却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合作社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体制下小农受压迫的问题。合作社本身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存活，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作。这就注定了，要么合作社内部发生两级分化，合作社被少数人掌握，多数人成为事实上的雇佣工人；要么合作社经营不下去，最终破产。

其次，从农民的现实情况来看，从 1998 年三农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20 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多数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农村户籍的新工人，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也没有意愿回到农村），农村留守人员被戏称为 386199¹部队。二是土地规模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流转，部分农户耕种面积已经较大，不再是曾经的小农经济。三是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农业生产已经逐渐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大资本瞄准了农业产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农村今后将逐渐成为各类资本的天下²。在新的形势下，许多乡村建设活动分子遭遇新的困境——无农可支。到农村做什么呢？原来的服务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在大资本面前，生态农业和合作社举步维艰。这些乡村建设活动分子，热血青年，将何去何从？

第五节 马列毛主义思潮

马列毛主义思潮，是新世纪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思潮。

¹ 38 指妇女，61 指儿童，99 指老人。

² 事实上，以前农村曾经存在过的产业，如生猪、家禽养殖业，已不再存在，现在从事这些产业的都是大资本，养殖生猪规模都在百万头以上。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丰碑；当今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新的社会变革，将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依靠新一代无产阶级，取得伟大的胜利。

老左派的一部分，以魏巍、李成瑞、马宾、刘实和韩西雅等人为代表，在新世纪逐步转变思想，成为马列毛主义者。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魏巍发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文章回顾了20世纪的伟大革命，历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若干特征，批判了“补课论”思想，展望了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新的斗争。

2010年，李成瑞出版《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李成瑞在书中指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领域，随着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运用了一些新的策略，在具体行动上，就是采取一些改良措施，主要是利用二次分配搞一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加强扫黄打黑、惩办一些贪污犯，以改善政府的形象。但是，所有这些，决不能逾越一条底线——坚持和强化已经形成的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和深化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成为雇佣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地位。

2008年，马宾出版《纪念毛泽东》。马宾认为应该“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2008年，刘实、韩西雅等人以魏公哲为笔名出版《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等多方面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的巨大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演变。

以魏巍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马列毛主义者已经逐渐老去或故去，新一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正在迅速成长，其主体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其人数目前较少，力量仍然是非常弱小的，他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性质、今后社会变革的路线，仍在探索和争论中。毫无疑问，这个群体将是今后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力量。

参考资料

- 1、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 年。
- 2、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立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 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马立诚著，东方出版社，2015 年。
- 4、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

当代中国左翼思潮中的民族主义

第一节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本身的历史不长，西方大部分民族是在中世纪末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相互间交往范围越来越广，形成统一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这是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语言和文化，为民族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战争在民族形成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往往是民族形成的催化剂。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和民族本身往往同步产生，为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而创立的，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关——即国家——政府部门、军队、宣传、教育等保证了民族的稳定性。民族主义是形成民族和民族国家时同步形成的意识形态，是运动的合法性旗帜，基本主张是一个民族应自我统治而不是被其他民族统治，民族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民族之间矛盾优先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但基于民族主义口号建立的国家不是超越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控政权，民族国家就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主义往往用以掩盖国内阶级矛盾、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壮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在西方，它曾帮助资产阶级凝聚人民的力量，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笼；在东方，它曾帮助殖民地人民凝聚力量，打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当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时，民族主义就成了统治阶级麻痹群众、转移矛盾的精神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均对民族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驳斥资产阶级指责说，“工人没有祖国……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

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恩格斯也曾说：“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培养黠武主义以准备内战”。列宁甚至痛斥爱国主义，“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因为“谁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自然就会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就得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关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接近和团结起来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伟大斗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时期，民族主义都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复辟的今天，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的今天，宣扬民族主义就不再是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行为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一批曾经的左翼学者，用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词语为民族主义鼓与吹，其本质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群众，为资产阶级的扩张摇旗呐喊。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该在理论上认清他们的本质，在行动上揭露他们的行为。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及演变

（一）90年代前：被批判和被边缘化的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应对来自中国外部的压力始终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救亡阶段，民族主义既是尖锐危机激发的自然情感反应，也是团结反抗侵略力量的有力口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其领

导的革命突破了民族叙事的狭隘视野，主张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将民族解放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到整个革命事业之中，如此一来，民族利益不再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信奉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也能够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宣传离不开国际主义的大基调，保家卫国保卫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我们在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同时，也高呼“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看齐，对本国经济、制度、文化的态度由自豪转向质疑，从伤痕文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宣泄式反思，到全盘否定中国制度文化、要求全盘拥抱“蓝色文明”的《河殤》，再到“六四”的爆发，民族自卑（或称为“逆向民族主义”）成为 80 年代的主流，而执政党需要为其打开国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一倾向。此外，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需要与中国联手抗衡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相对友好缓和，这更加给中国民众眼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蒙上了一层梦幻色彩。

（二）90 年代至 2008 年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之声渐起

90 年代是市场化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改革导致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等问题突出，相比于将矛头直接指向当局、揭露批判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本质，将矛头对准外部则更加易于接受，政治风险也更低。另一方面，“六四”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亟需填补共产主义信仰离场后的政治信仰空缺，同时也要尽快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内部矛盾转移开来，民族主义成为有

效的官方政治宣传工具。在此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联合的动机削弱，其友好和善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民众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上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敌意，同时中国外交的趋于软化在民间也激起对**帝国主义**愤恨的情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者集中于指责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争抢国内资源、遏制中国崛起、干涉中国内政。

进入 21 世纪，中国重新加入 WTO，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开始正面竞争。但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似乎为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资本家）带来了近 7 年的持续改善，矛盾只是在暗中积蓄。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主要的担忧在于民族工业（资本）受到国外资本冲击，认为自由开放的市场将扼杀尚不成熟的民族企业，主张对重点领域实施政策保护，限制进口和外资进入，使其在没有外来产品竞争和外国资本挤压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也是“新左派”声名初起之时，汪晖、旷新年、何新等代表人物均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霸权的批判，如“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加工工业，等于给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西方抽去了，还把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汪晖）；“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华文明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黑暗和痛苦，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旷新年）；“我认为美国对华既有一个短期的安抚政策，还有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就是必须遏制中国走向强大”（何新）。

同时，老左派也强烈质疑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

挤压。如程恩富所说：“正是在这种认为民族工业已经过时的流行观点的误导下，有些地区和部门‘招商引资’而不‘招商选资’，大搞国内的无序竞争，利用跨国公司消灭本国民族企业竞争对手，甚至放任外资对我国战略产业的恶意并购。这种只知道赚钱，不知道自主发展，只注重眼前利益，不知道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已逐渐显示出过度依赖外资的依附性危害”。

（三）经济危机至今：民族主义从民间到官方、口号从“图存”到“崛起”

及至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和停滞，中国先后于 2009 年和 2014 年采取两轮大规模刺激计划，对冲外部需求不足造成的冲击。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速平稳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增速：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端的产业如通信、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也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经济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互补之余，竞争色彩越来越强。中国抛弃“闷声发大财”的低调形象，不再避讳展现自身实力，并开始寻求更强的政治存在感，特别是新一代领导核心上任以来，经济上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6 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 2008 年的 3.5 倍，政治上更加活跃，在南海、日本、朝鲜等问题上更加强硬，并积极参与维和等国际事务，这有意无意中终结了延续二十余年的“去政治化”趋势，培育了一轮“再政治化”的浪潮。浓厚的政治氛围不仅弥漫在国内，也有国际环境内外呼应：“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都标示着民众对政治参与不断高涨的热情。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后，潜在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不得不与美国正面对抗。

同时，长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使得城市中产阶层人数显著增加。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按照拥有 5 万至 50 万美元净财富的中产阶级标准，2015 年中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达到 20.1%。中产阶层在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品尝到了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持续提升，他们期待中国崛起继续做大蛋糕，同时恐惧经济恶化或政治动荡剥夺他们现有的安稳生活，是“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天然支持者，可以说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倾向民族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民族主义氛围愈加强烈，原本活跃在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官方认可，成为“主旋律”：电影“战狼 2”“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三部宣扬民族自豪的大片接连上映，官方媒体以国际锐评、人民日报“九评”等形式高密度点评贸易战进展，重点批判美国政策措施，表明官方立场，塑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舆论氛围。这种氛围在华为任正非接受采访达到高潮，任正非两万字的访谈记录形成现象级传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豪言壮语使得一个民营企业家成为了“凝聚各阶层共识”的标杆人物。

第三节 左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已完成转轨，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社会矛盾积聚、外部压力强劲，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之一，不可避免地影响渗透到左翼思潮中，并已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实：国家利益优先，坚决打赢中美争霸战

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下，左翼民族主义的重心是打赢中美贸易战，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挤压，扩展中国的资源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为继续发展创造条件：

“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本质，以及它的‘逻辑’也不会改变，为了维护霸权，‘争夺霸权’，必须遏制中国发展，

这就成了美国的‘国策’”“我们不仅要丢掉幻想，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务求多胜大胜全胜。这里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对准美国的软肋、要害、痛处，‘集中优势兵力’、优势资源，‘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岳青山：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打赢抗美贸易战）

“现在的情况是：北方国家的人一致剥削南方国家的人，大量资源和利润回流到北方国家，才能在北方国家中培养出一个人数居多的中产阶级……避免了阶级斗争的激化”“我们要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并以此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也来一个‘工人阶级贵族化’”。（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而要打赢贸易战，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确保集中全国资源投向重点战略领域，实施扶持民族工业的政策，培育足以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

“面对美国以‘国家紧急状态’发起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的疯狂打击，中国怎样在这场新形势下的中美高科技上甘岭战役中取得最后胜利？当前中国应该给予华为、大疆、海康威视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同时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通过对美国公司发起反击来策应和支持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战斗”。（李光满：特朗普以国运相赌，华为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怎么办？）

“华为研发的技术与阿里研发的技术之所以不同，在于华为所研发的硬核技术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之大，足以让美国心惊肉跳，让美国担心，总有一天，中国会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把美国甩在后面，美国再想利用科技的优势来薅全世界的羊毛，即将成为过去的事了”。（胡懋仁：为什么华为被美国针对，阿里却安然无事）

当然，企业也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要与国外资本竞争、与国内资本合作，绝不能与国内企业“窝里斗”：

“衡量当代新资产阶级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标志，主要看两点：第一点，是不是能够对毛泽东主席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亦即国父）有足够的尊重？第二点，是不是把‘产业报国’作为一条绝对律令置于利润最大化之上？从这次联想事件以及资产阶级此前自鸣得意的种种表现看，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及格。”（郭松民|联想事件：资产阶级向何处去？）

“只要自己人不拖后腿，只要全行业都能支持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想做的，总会做成。终有一天，用国产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申鹏|华为启示录：做企业，要有决心和战略搞技术的自主创新）

那么对于被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呢？鼓吹民族主义的左翼学者不敢公然抛弃无产阶级，只能惺惺作态地承认，正是无产阶级“忍辱负重”的奉献才将中国建设成了伟大的国家：

“所有这一切变化，都要归功于我们的人民。正是他们，靠着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靠着他们忍辱负重的精神，靠着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把我们的国家一点一点地建设得更加辉煌，更加强大。……伟大的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几十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正在兴旺发达的国家”。（胡懋仁：人民的劳动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实际上却不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看似不提倡“996”这样不可持续的工作方式，但是却又认为华为的“996”和马云、刘强东的“996”不一样。他们成了资本家的吹鼓手，鼓吹剥削人民、制造 251 事件的资本家，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企业：

“从中兴、联想、华为企业发展和对美制裁的不同态度中，看出其企业家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观的根本对立。前两个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为主。而华为就是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企业发展

的灵魂和根本”“华为公司名义上是民营企业，但从整个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看，完全不像私人企业管卡压的方式，而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模式。因为它没有把股票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其管理的指导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郝贵生：对中美贸易战的反思及十点理性思考）

（二）对中国革命：强调民族自救，忽略社会革命

如何评价前后三十年的功过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长期以来，官方媒体以“不争论”的方式回避这一分歧，但在左翼民族主义观念里，两段时期的矛盾可以在经济成就上得以弥合，他们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高度赞扬沿袭苏联模式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避而不谈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最终将前后三十年统一为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

“可以说，20 世纪的中国史，主导脉络就是国共两党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是这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世界第一工业国，另一个跑到小岛上搞黑帮，共产党到底学到了什么？”被称为“工业党”宣言的《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给出了答案：学的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并总结出苏联工业化的三大特点：前所未有的高速、不依赖外部殖民地、逆势上涨。这些特点非常适合有被殖民历史的落后国家：

“从建国到解体，苏联的生命只有 69 年，……6 岁以前，年幼的苏联病病殃殃……到 35 岁的时候，苏联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能以这种速度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苏联工业化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不依赖外部殖民地，所以苏联经验更容易被中国这种前殖民地接受”“苏联工业化的最后一个特征是逆势上涨。……每当其他工业国衰退的时候，就是苏联工业化进程高涨的时候。苏联因此摆脱了其他后发国家卖身求生的命运”。（《大目

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三) 对传统文化：将孔夫子和马克思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封建小农经济，主流的儒家、法家学说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平天下”的政策工具，不管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但一些左派通过奇妙的方式将二者统一起来了：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 25 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了解。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甘阳：“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些不伦不类的“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过去被批判、被打倒的保守学说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支柱。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是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是统一的基础，再通过儒家、法家等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解释和改造，形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结合的新学说，赋予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崛起更加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四节 左翼民族主义批判

(一) 抓主要矛盾：当前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一百年前，中国人民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之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大山，就不能将政治

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转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这是当时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之所以新，不仅是要自强求富，更是要革除旧经济、旧政治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反动旧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若剥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则偏离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民族独立也就无法实现，民族主义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而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成为经济体量第二的大国，甚至可以尝试与世界第一的美国一争高下，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当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不再包含民族独立，这使得民族主义丧失了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再是当年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在世界 500 强中占据 120 多个席位的强大国际集团。所谓的贸易战，不过是中国资本国际扩张的需求越来越大，挤压了美国资本的扩张空间，引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侵略压迫存在本质的区别。

（二）停止内斗、共克时艰：民族主义在为谁摇旗呐喊？

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自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左翼民族主义者只看得见民族英雄企业华为足以在国际市场分一大杯羹的强大实力，却看不到“自愿”签署奋斗者协议的普通员工、35 岁被优化裁员的中层、长期加班猝死的码农、因索要赔偿金被拘留 251 天的受害者，对于这些普通劳动者来说，任正非老板究竟应该是被革命对象还是被追捧的英雄？

左翼民族主义者多少还是带有“左”的色彩的。他们并不

是总是讳言阶级矛盾，特别是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国情时，有时也不避讳国内阶级矛盾，但讨论止于无产阶级维持形式上的领导地位，似乎法律文本上的领导就是事实上的领导；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必须挂在嘴边的，但也只要挂在嘴边就够了，以至于看到任正非宣称学习毛泽东，就做出“华为的管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样荒诞的判断。一旦涉及现实斗争，他们立刻要求所有阶级停止内斗、共克时艰，要求无产阶级无条件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确保国内稳定的发展环境，甚至适当给资本让利，“勒紧裤腰带”，保住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为本国资本扩张添砖加瓦，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表现。

（三）中华民族崛起：民族主义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当今的左翼民族主义诉求已不是作为被侵略国的“救亡图存”，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华崛起”，每每激动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欣喜于中国在国际争端上的强势表现——“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可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对准国外，也可以在两个阶级搏斗时对准本国无产阶级；中国可以对国外耍流氓，也可以对本国无产阶级耍流氓。

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趋势已经不容忽视，这一趋势为左翼民族主义者所乐见。若听从民族主义的主张，民族利益优先的思想在中美争霸的刺激下演化为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开始追捧悠久文明历史——特别是其中落后的部分，美化所谓民族特色，抗拒民主自由体制主张，要求与民族地位相匹配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此推演，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发展出法西斯主义，当然，不一定是军事入侵，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这并非没有先例，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前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正是从强调日本国家中心主义开始，“皇大御国作

为大地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尽快达成现代化，快速现代化需要倚重国家专制力量，为此放弃政治民主，肯定暴力行径和民族歧视意识，日本对外扩张就是优越征服落后的必然。

第五节 结语

左翼民族主义在中国对外扩张受阻、内部发展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显著活跃起来。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号称“左”，然而本质是为国内资产阶级扩张摇旗呐喊，他们将本国无产阶级利益与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混为一谈，支持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要求国内阶级合作、一致对外；他们虽然口头上赞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只是将其看作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手段，并将所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强行嫁接，意图从“自古以来”天朝上国的历史中寻找民族崛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管左翼民族主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中华民族崛起乃至称霸的愿景多么诱人，都不能忘记《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色中国网部分错误思潮批判

自 2012 年左翼网站遭遇集体封杀之后，红色中国网作为境外左翼网站，在国内左翼发声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其便利条件，在左翼宣传与鼓动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红中网的一大特色是大量的理论争鸣与思想碰撞，这为左翼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红中网编辑部集中了一批留美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政治经济学观点，也关注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左翼动态，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并积极参与国内左翼活动。红中网编辑部对于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政策和策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集中体现在以主编远航一号为核心的红中网编辑部的一系列论述中。

但是，红中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论述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长期生活在海外，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精英思想等问题若不能有效克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引起左翼思想的混乱。

第一节 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定帝国主义

论

远航一号认为：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

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红色中国时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井冈山卫士认为：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这些说法，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

说它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是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是因无法达成妥协而升级，贸易战早已超出了双边贸易的范围，而上升为以中美两国为主、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参与的高科技之战、遏制与反遏制之战，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中国资

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中美谈判中的妥协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中美两国的力量也存在很大差异，分工上长期互补，但决不能说明“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这种判断与中美“夫妻论”并无二致，只是立场有区别。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际垄断资本之间一定范围内的妥协与合作决不是排斥竞争与斗争，而只能理解为竞争与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像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遏制政策始终是不会改变的，“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根源，在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帝国主义论与世界体系论，并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与发展。但是，两种理论体系对时代特征的理解有着重大区别。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两种：

一种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矛盾，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帝国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特殊的压迫与剥削政策，比如现在时髦的“剥夺性积累”、“帝国主义租”等说法。这些政策可以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具体情况而变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

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 154 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 33 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理论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是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这种重视外因（分工地位）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十余年前，中国刚加入 WTO 时，中国的国际分工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左翼一片“殖民地化”的痛惜之声，但十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有着显著提高的，说明分工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并不是“自变量”。当年流行一时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逐渐在青年中丧失市场，左翼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国家的内在结构差异的考

察，转向了国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远航一号等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强大与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值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和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家矛盾日益尖锐化、不可调和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相反，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 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远航

一号等同志鼓吹的当代超帝国主义理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反思，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理论，不管其现在的言辞看上去如何革命与激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下问题：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度？是内部的金融垄断资本阻碍并窒息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外部势力（所谓的中心国家）决定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认识，马列毛主义者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些判断进一步影响着我們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判断，不可不察。关于“中帝论”相关问题，本书“时代特征”篇有更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对工人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要考察工人斗争的效果，还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是不是从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从而缩小了资本家可以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份额。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由于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在中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了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和官僚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缩小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的投资就要下降；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有些资本家会企图通过举债投资的方式来维持积累，从而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会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陷入危机，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陷入政治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工人工资的上涨会造成经济危机吗（利润挤压论的核心观点）？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吗？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论不同，利润挤压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业后备军人数下降将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会导致利润日趋下滑，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和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工人福利太好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在西方左翼中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利润挤压论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而是巨大的倒退。比如在卡莱茨基看来，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是对资本的主要威胁，因为公司拥有定价权。安瓦尔·谢克认为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无效的，它只考察了事物的表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争论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说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这种说法也是既不符合中国现实，也不符合马列毛理论。

远航一号认为：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明显出现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2010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大约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了2013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上升到41%，而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下降到28%。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基本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的基本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于暂时稳定，资产阶级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资产

阶级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而统治基础的动摇是其走向垮台的第一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

高调的口号固然能得到一片赞赏，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工人的自发力量固然可能在劳动力价格的涨跌中发展壮大，但这远远不能说明远航一号津津乐道的“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局面已经出现了，也不能证明远航一号所谓的“相持阶段”论能够成立。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那社会主义革命真是件很简单的事，劳心费力的组织工作也成为多余的了。

首先，工人的力量体现在组织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涨跌没有实质性意义。

2010年之后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快速城镇化进程。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升。这种增长更多是补偿性的，即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新工人劳动力供应过剩导致工人工资严重低于维持城市正常生活的劳动力价格，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速，也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导致新工人产生“用脚投票”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一个农村居民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总支出，仅相当于城市中下等收入户的一半左右。这在种大背景下，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些因素推动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如果从工人数量增长这个角来谈工人力量增加是可以的，这个时期的工资上涨显然是由资本高速扩张期工人的被动防御（用脚投票）造成的，远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

另一个极端的反例是1978—198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曾一度增加：在这段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效应（主要职工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1.8个百分点，产业间效应

（主要农民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两种效应叠加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4 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收买农民，国家一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致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另外，企业的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也在润物无声地进行，为顺利推行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奖金制度，也一度促使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动。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这两项都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手段，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相反，是牺牲劳动者的政治权利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对资产阶级而言，这个买卖十分划算。政治权利丧失后，经济利益也就没有任何保障了，这很快就被历史所证实。

贝弗里·J.西尔弗在其名著《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将劳工的力量分为两大类：一为组织性力量，即劳工结社产生的力量；二为结构性力量，即劳工由于生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的与资本对抗的力量，结构性力量又分两种，一为市场谈判能力，即劳动市场中劳工相对于资本的优劣地位，二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由于自己在生产流程中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相对资本的优劣地位。这种分类法颇有参考价值。

在工人力量中最重要部分——组织性力量的获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上涨并非是必要条件。工人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对于经济斗争而言是一个有利条件，工人在萧条与危机时期则很难争取到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引导得当，这个时候工人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可以得到飞跃发展，而这比获得一点随时可能失去的经济利益，显然要重要得多。

所以，远航一号所津津乐道的劳动份额的上涨，即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的增强，且不说有多少是事实，这部分恰恰是工人力量中最不重要的、最易失去的部分。

列宁说：“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团结去谈力量，十分空洞无力。

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发表于 2015 年初。2010 年至 2012 年，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比现今更强一些，阶级斗争的战线推进得更靠前一些。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从 2013 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资产阶级发起进攻，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再次被打散，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远航一号在 2015 年初罔顾事实，断言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是非常轻率的。

第三节 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

远航一号认为：

……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

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

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这几段文字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远航一号的工会观，其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形左实右的。

首先，因为“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所以“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这是将工人斗争的主动权完全交予资产阶级。但是，任何国家的工人组织权都不是资方恩赐的，包括资格最老的英国工联在内。英国议会在1799年和1800年通过了全面禁止工人在一切行业里组织工会的法令，在该法令存在的20多年中，工会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组织也越来越健全，直到1824年这项法令被迫取消。资产阶级不会听任工人组织工会，工人也不会听任远航一号的说教而不组织工会。事实上，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已经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他们数量虽小，但却代表着工人自发运动的方向，只有无视现实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其次，工会不必然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列宁在《怎么

办》中就曾论述怎么搞地下工会。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民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权力的国家，本身就不必然有合法工会存在的空间，但是，工人却必然要在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这是由雇佣劳动制本身决定的。2010 年-2012 年间，在大的斗争背景下，工人成立了数十个公开、合法的工会，作为自身争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从 2013 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这些曾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的坚持。在公开、合法的工会难以为继的时候，2018 年塔吊工人罢工后成立了俱乐部，事实上执行着工会职能，它没有名义，但却公开的存在，它是典型的灰色工会。能够公开就公开，能够合法就合法，不能公开合法，就地下，就非法，俄国人这么搞过，中国也有工人在这样搞。机械地认为工会一定是公开、合法的，是远航一号的又一错误。

远航一号认为，“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这是典型的自发性崇拜，幻想工人能跳过公开的、群众性的组织训练过程，在所谓的“革命形势”中迅速超越工会斗争阶段，达到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地位。英国工人在能够公开合法地建立工会之前（1825 年），已经地下非法地搞了几十年工会。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力量利用出现的短暂的有利形势，快速大规模地建立工会。俄国工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俄国工人在 1905 年之后才能合法、公开建立工会，但是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搞地下工会。难道列宁会因为 1905 年工人提出超越工会范围的要求，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准备时期搞工会

吗？不会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明确说到，“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是否让步，远航一号更是糊涂。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幻想靠工会的有限让步就能维持其统治，正如沙皇也从来没有这样幻想一样。但是，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的，不是他们的幻想，而是现实的力量。1905年前，俄国的工会基本都是地下的（除了祖巴托夫这些宪兵搞的黄色工会外），1905年革命爆发后，不以沙皇意志为转移，工会爆炸式地增长。试问远航一号，俄国工会的建立，是沙皇有了什么幻想吗？

远航一号认为，“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

这个观点是极其狭隘的，这说明远航一号历史知识匮乏，且战略眼光短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大的作用根本就不是帮助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纽带，是党在退却时期保存力量的地方，是党在相持时期积蓄力量、训练工人斗争的学校，是党在进攻时期动员最广大工人的工具。至于起到最大作用的工会，更不是二十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工会，而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会，以及1905年后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这类工会的活动极其丰富，社会主义者通过工会中的支部开展工作，搞小组学习，请布尔什维克做政治报告，搞秘密集会，发动经济斗争，搞固定节日的示威游行，等等。《苏共党史》第二卷第六章有一段讲述这种工会的日常活动：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活动

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以郊游为幌子搞群众集会，以讲座为名头搞政治报告，利用其工作地点组织党小组学习，等等。这还只是日常活动，至于斗争时期的活动，那就更为丰富了。工人在这样的工会带领下，极富战斗性。眼睛就盯着资产阶级游戏规则内的合法工会，并把这种工会视为工会的唯一形式，当然只会得出工会无用的荒谬结论。

远航一号认为，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因此，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更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

这更是逻辑混乱、倒因为果。“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的衰落，正是国际工运低潮与资产阶级反扑的结果，丝毫不能得出工会无用的结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打压下，工会成员率持续下降，罢工受到进一步限制。英国保守党恢复了反工会立法，要求提前向警察提交举行示威活动的申请，禁止会员通过网络投票来决定是否采取罢工行动。这说明，无论工会斗争低迷到什么程度，资本仇视、敌视工会的本性不会改变，比如沃尔玛一直坚决抵制工会。资产阶级的政治敏锐与阶级觉悟要远高于远航一号。

而“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所谓“新中间阶层”的崛起，传统产业工人比例逐渐降低，工会运动面临新的挑战。而当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于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民经历了快速无产者化的过程，工人阶级占劳动人口比重已近70%，产业工人数量迅猛增长，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工人阶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经历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团结意识与斗争意识相比老一辈工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会意识呼之欲出，这正是启蒙工会意识、开展工会

斗争的肥沃土壤。

远航一号将希望寄托于“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的斗争形式，这是不了解工人斗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趋势，坐在书斋与酒桌旁产生的完美臆想。

如果说单次的罢工是工人“战争的学校”，是工人临时和非松散的形式，那么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种临时的联合形式必将发展成为持久和紧密的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就是工会（而不管它叫什么）。罢工不是万能的，上访更不是万能的，“有威信的优秀分子”也绝不能替代群众化的组织趋势，否则工人运动将永远处于手工作业阶段。无论工人的单次罢工组织得多么出色，罢工的规模、影响有多大，如果没有某种紧密的联合形式，没有某种长期的斗争手段，工人斗争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在过去的国企保卫战阶段，的确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多为退休或下岗职工），在长期的上访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一度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但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基本结束，这种斗争已近结束。而在新工人中产生的相对长期和紧密的联合形式的渴求，反应了新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和斗争形式的升级。幻想用过去的、已逐渐式微的斗争形式来指导未来的斗争是行不通的。至于是公开还是秘密或者半秘密，这个视情况而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应该帮助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公开建立工会，因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把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自然不会强行建立公开工会，给敌人树立打击的目标。

远航一号称，“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这是对工人斗争理论与历史的

无知。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的、成功的群众观是“哪里有群众，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旧俄国与旧中国哪个不是专制统治条件？共产党人照样可以进入黄色工会、反动议会中进行工作，并成功地掌握群众、有效地开展公开的群众工作。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本就是合法和非法结合，公开和秘密结合。在明知是专制统治条件下，藐视“合法”工作，抛弃合法工作，只强调所谓“违法”的工作，这是貌似革命实则幼稚。列宁将这类口头激进、回避实际行动的人称为形左实右的“召回派”，即另一个方向的“取消派”。这的确是深刻的洞见。（召回派是1906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出现于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为代表。因要求从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故名。他们反对列宁，坚决拒绝在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半合法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竭力主张进行秘密活动，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列宁称它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1909年6月，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第四节 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

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其迫切的任务，还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着手解决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培养干部，扩大和巩固在群众中的影响，将自己变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

.....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真是奇谈怪论。远航一号认为分属不同民族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是铁板一块，中美大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早已形成统一市场、统一交通网络和统一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却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分裂，在经济危机来时还会出现割据的局面，给无产阶级以可趁之机，甚至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远航一号看来，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各个地方政府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

可惜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政府因为无

法满足群众的教育、医疗和治安等公共需要，就会放弃政权，让这些地方的群众“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这是异想天开，是最粗陋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再失败的统治者也不会主动放弃镇压之权。

而远航一号幻想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灵感来自于西南某市 2012 年之前的短暂实践。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远航一号称这位市委书记为“同志”，视之为“资产阶级左翼”。远航一号等主张“团结”中国的“资产阶级左翼”，可是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真的存在吗，有何进步意义？且不说这位“资产阶级左翼”对无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即便他真有占山为王的想法，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统治集团的分裂与割据，而回避手头具体可行的工作，称为无用、过时、不可行，远航一号口口声声所谓的“自信”，原来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分裂的“他信”。不错，统治集团内部的确有矛盾，但面对无产阶级时却是统一的整体，尤其是无产者还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没有先进阶级的强大组织而去奢谈所谓“统战”，结果只能是投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第五节 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

论

远航一号说：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

结果。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2019 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在灌输论问题上，远航一号等人的自发性崇拜更是暴露无遗。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完全正确。但是，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远航一号同志，其主要工作也并不是在等待资本主义矛盾的“客观上发展”，而是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宣传鼓动工作，也即列宁所说的“灌输”工作。我们也十分赞赏远航一号同志这样的工作态度。列宁说得好：“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当作出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经济基础与政治灌输，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不知道远航一号为什么要对立起来。

远航一号同志提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也完全正确。但是，据此来反对“灌输”，这就混淆了作为马列主义原则的“灌输”和通常理解的作为工作方法的填鸭式“灌输”的区别。坚持灌输论与反对简单粗暴的灌输并无任何矛盾。我们无从得知远航一号同志想要表达什么，或者等待“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就可以了？或者远航一号认为只能自己去“灌输”，别人不能去“灌输”？

第六节 结语

本文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包括红色中国网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无论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动机如何，这些看似革命的、精致的话语体系客观上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留下了后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巩固起来的，过去是这样，今天和未来也一定是这样。所以，学会辨析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是我们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必修课，也是左翼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进步成熟的必修课。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左翼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尚未对群众运动产生直接影响，这只是因为目前群众运动发展水平低下。在运动发展起来后，红色中国网的这些观点及与之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一定会顽强地冒出来，并试图掌握群众，影响运动的方向。而统治者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此，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提高我们的理论上的免疫力，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